

专题

← (上接5版)

异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的比较参照机会。

黄仁宇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国民党改变了中国的上层,共产党改变了中国的基层。中国基层的改变在中国是非常明显的,韩老师刚开始讲了乡间的交易、祭祀、婚姻、行政等等,这几件事在合作化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交易市场是非常重要的,里面涉及很多问题,施坚雅很重视,但合作化以后,被统一的供销社取代了。这种大小供销社在农村广泛分布,商品有计划供给。土地制度当然更重要。解放初,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变成了集体所有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从生产队获得的报酬按照工分计算。与外面进行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销售,也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来进行的。

我们去农村的时候,脑子里带着毛主席的一句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教育农民什么呢?有很多学者讨论过,是教育农民交公粮,支援国家建设和工业建设。过去有一个讲法叫剪刀差,工业商品价格很高,农产品价格被压得很低,农村以廉价产品支援城市,为此农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对比合作化时代和韩老师讲的传统时代,可以认识到合作化时代改革的意图,以及为什么改了几十年之后就做不下去了。这里面有很多珍贵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

再说一点交易活动。公社时期,规模大一点的村里都有供销社,社员不用出村子就可以买到盐、醋、肥皂、火柴、针线这些日用工业用品。那时,商品交换是在计划中进行的。因为“以粮为纲”,农民除了粮食以外不大生产别的东西。我们当时甚至错误地把列宁的一句话用在了农民身上——“小生产者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愿地、大量地生产资本主义”。以为不能给农民商业自由。实际上在韩老师所讲的传统二元商品体制下,农村是走不到资本主义的。韩老师指出,农民在十里八村范围内自给自足的商品交换,跟城镇的商业是两个系统。农民的那点商品交换发展到资本主义是很困难的。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农民的经济本性,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商品交换的二元化是破解中国北方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韩老师刚才讲的关于水利的细节也很有意思,我们在农村都见过。当时我们没有渠长,有的是干部。比较大的生产队里都有几个熟悉渠道的人,干

部就和他们结合起来组织灌溉指挥小组。灌溉期间是非常紧张的,都是二十四个小时不睡觉,拿着手表闹钟掌控供水时间。一片地、一片地,按着次序计时供水,谁也不能多占。上渠是苦活儿,但也是好活儿,工分高,有鱼吃。

关于乡村精英群体的形成,我们那时已经没有了预付资本的情况。但是在同一个生产队里,各家的光景依然看起来不一样。殷实的家庭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手段,区别就在于他们更加勤劳能干,别人睡觉偷懒的时候他们去修一下自家墙头或者去捡麦穗,在基本自给自足的环境中,勤奋和个人能力是很管用的。从社会学角度看,农村里面有两种能人,(这一点很像传统社会),一种人有头脑,对什么问题都有高见,慢慢建立起威望,这种人有点像古代的萧何。还有一种人,他们会在特殊的时候起很大的作用,他们很聪明,但不务正业,敢赖、敢闹,这种人老乡叫他们“挥旗杆子”,刘邦早年大约就有这样的色彩。平时谁都烦这种人,也拿他们没办法,不过这样的人在特殊的时候敢出头。在一个稳定的,经济水平、文化水平都不高的基层社会群体中,自下而上地出现这样的一些角色,是常见的。

由此我们想到传统农村有一种自组织的机制,这个机制维持着传统基层社会上千年的运转和稳定,进而形成了一种理念和传统。比如农村盖房子,打地基、上大梁特别重要,这时村民都会来帮忙,形成一种村民集体活动,这是一种合作机制,人民公社时还是这样。另外,农村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精英群体会出来维持社会的稳定,有会“主事”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种精英会结成一个反叛的机制,村里头那帮“挥旗杆子”就有这种潜质。传统农村社会具有两面性,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获得机会,产生不同的旋律。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我们应该研究农村,应该了解中国农村的历史,这太重要了。

韩老师层层深入,讲述了“十里八村”这个词对于农村空间的意义。我一边听一边回忆,那时,除了自己的村子,常常谈到的周围村子,也差不多就是七八个。我们知青还喜欢到县城去逛,去买东西,农民很少去,他们不需要到城关。农民的生活范围确实非常小。当然也有极个别的,我去过一个社员家,他居然挂着穿西服的照片,那是个敢到外面闯的人,找机会“倒黑市”,但这种人非常非常少。费孝通说村子是熟人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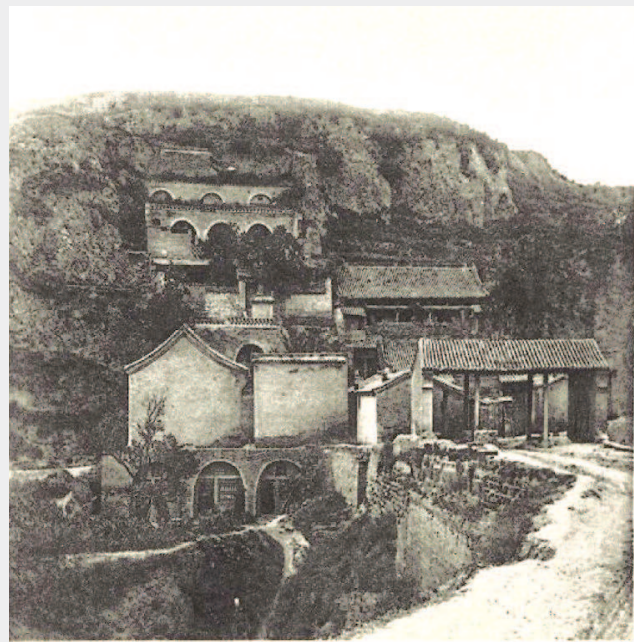
会,这样的社会容忍性强,他在外面倒黑市,回来照样是乡亲。有个有意思的情况,在熟人社会里,名字其实也是不重要的,一看脸就知道是你,还起什么正经名字啊。农民不需要到陌生的空间去对陌生人讲自己叫什么。我认识一个老汉,叫“季三肉蛋”。他原来用不着名字,后来政府登记户口说你得有一个名字。他姓季,排行老三,脑袋瓜很大。行了,你就叫季三肉蛋,写在户口本上了。

现在农村全变了,前年,我回到农村,看到的是完全陌生的世界。村子里壮年人都不见了,这个小社会变得残缺不全,人气萧条,“熟人”也熟不了几天,几乎是整年地散在天南地北。作为群体社会,群体文化,它们还存在吗?另一方面,过去农村妇女干活,直接太阳晒着,不在乎。现在一看,草帽、口罩、手套全戴上了。这还是农民吗?农村未来是什么样子的,真是说不清楚。

韩茂莉:我特别爱听唐老师讲农村,因为农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体会不到农村有意思的地方,但是知识青年的视角就不一样。唐老师说到“挥旗杆子”,他们早期也是规规矩矩付出预付资本,但中期以后管理层不断洗牌,因为“挥旗杆子”开始出现了,造成了频繁械斗。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预付资本包括械斗,械斗中能打的就变成渠长,也有在械斗中死了人的人家,这家人就很可能持续地当渠长。

历史地理研究是根据“是什么”解释出“为什么”

冯健(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我本人是研究城市社会地理的,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各种活动空间相对复杂。韩老师研究的乡村社会地理问题有的我也考虑过,但我没有找到突破口,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乡村社会地理的复杂性。韩老师的研究综合了地理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比如社会学比较强调社会精英的作用,这一视角也被韩老师吸收到其研究中。我在上大学之前,当了十八年的农民。我是江苏沛县人,刘邦的同乡,从小听着《大风歌》、听着刘邦的故事长大,我们老家的整个地域文化风格都受刘



1907年10月1日,韩侯岭山脚关帝庙



1907年10月2日,灵石县,汾河



1907年10月2日,灵石县,乡村



1907年10月22-23日,大同府街道

1907年10月,五台山脚下村庄的一块影壁
均法国汉学家沙畹摄

(下转7版) →